

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

血泪凝成的悲剧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悲剧因何而起

荒唐和残酷的闹剧

延安审干运动始末

国防部长蒙难记

彭德怀元帅案始末

「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反右斗争纪实

共和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冤案的前前后后



62579/03

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

作者:黄启亮

责任编辑:袁敏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32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7-215-03001-6/K·447

定价:11.80 元



前言

冤狱，冤狱，冤狱，一个令人熟悉的心有余悸的字眼，一个缠绕历史时隐时现的幽灵。

在中国历史上，冤狱神秘莫测，从古至今持续不断，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冤狱发生，无数人蒙受不白之冤，考究产生这些冤狱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臣民百姓随时会招来杀身之祸。“天行常道”，中国历史推演到20世纪30年代，冤狱的幽灵仍在徘徊游荡。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冤狱在延续着。

本已作鸟兽散的AB团被大张旗鼓地当做打击对象，以致酿成富国事变。

一句被无知者误喊出的口号使许多人人头落地。

年轻的将军惨遭杀害，只是因为不屈从于当权者的淫威与独断。

元帅被贬，起因于一封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的私人信件。

共和国主席的无端受辱，皆系于宪法的有名无实。……

本书选取的一些重大冤案，其发生的原因并非一两句话可以解释清楚。这里有专制的余毒未散，这里有教条主义者的飞扬跋扈，这里有阴谋家的混水摸鱼，这里有领导人的偏听偏信，这里有无知与偏见，……

本书摘录的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上的真实事件，吸收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许有人担心这会给共产党丢乖现丑，其实读过此书，这种顾虑便会自然消失。我们编写

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揭露与展示，只是希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回顾与研究，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因为我们相信，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有许多功能，照相是其中一种，有人拿之悦容，有人拿之揭丑。我们衷心的愿望是让本书起到一面小小的镜子的作用，照到现实与未来的某些层面。

冤、假、错案离不开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脱离这些条件，就会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因此本书既有细节的铺陈，也有理性的分析，雅、俗共赏。

本书是几个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学人对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与反思，他们把这个小小的成果敬献给大家。

但愿历史不再重现，但愿悲剧不再重演。

目 录

血泪凝成的悲剧

-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悲剧
因何而起 (1)

荒唐和残酷的闹剧

- 延安审干运动始末 (51)

胡风

- 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大被迫害冤案 (76)

国防部长蒙难记

- 彭德怀元帅案始末 (119)

“东风”压倒“西风”

- 1957年反右斗争纪实 (160)

共和国最大的冤案

- 刘少奇冤案的前前后后 (198)

震惊全国的大案

- 所谓“61人叛徒案”真相 (255)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 陶铸冤案始末 (298)

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

- 贺龙冤案纪实 (340)

“打不倒的小个子”

- 邓小平三起三落案 (372)

血和泪的悲剧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 肃反悲剧因何而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溺亡于血雨腥风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崭新道路。

然而，在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不久，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却开始了。无数的群众、共产党员被逮捕、关押，其中一些人神秘的消失。无辜者遭到关押，说真话者被打成反革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这场悲剧为什么能够持续四年之久？波及的范围又为何如此之广？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等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竟无一幸免？仅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赣西南、闽西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几个大的根据地着眼，就能看到整个肃反运动的全貌。

1. 狂澜起于富田，中央苏区开始大肃反。有人借机大反毛泽东，红二十军被解散，大部分干部被自己人处决。

江西富田，省苏维埃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夜，朦朦细

雨飞溅，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富田。一群红军战士悄悄地包围了省苏维埃所在的一幢房屋。警卫的红军战士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就被缴了械。突袭者释放了被关押的十几名“AB团分子”，捣毁了省苏维埃政府，这就是爆发在中央根据地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引发了中央根据地的大肃反运动。

“富田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事情要从这年年初说起。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县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潘星元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的既领导军队又领导地方的前委。2月16日，前委发布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从此在赣西南苏区内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强调“要完成党的任务必须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在赣西南兴起。

3月至5月，报告在莲花县、永新县先后报告发现AB团组织。为此，6月，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政组派AB团宣传大纲》。《大纲》指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地主豪绅的集合场”，AB团“最近并借军阀淫威用烧杀政策威胁群众入宁望队（指地主豪绅组织的自卫武装——引者），指示工农杀工农”，或“潜伏在赤色区域内……破坏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破坏分团，带动反动军队捕杀工人农民革命同志，企图推翻革命”。

特委要求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为“肃清红旗下

的奸细”，必须“实行赤色恐怖”。赣西南开始在苏维埃政府中以抓 AB 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

很快，肃清 AB 团就取得了“重大的收获”。1930 年 7 月 22 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指出：AB 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地区、安福西南区都有 AB 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 AB 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赣西南东路行委的一份报告也指出，“最近整个赣西南都破获了 AB 团的组织，捕杀了许多 AB 团的首领，供出了 AB 团的捣乱计划”，“东路 AB 团的组织，亦有很多，现正着手进行破获 AB 团的工作，拘捕 AB 的分子”。

赣西南特委机关开展肃反时，发现在团特委发行科工作的朱家浩工作比较消极，表现不太好。肃反运动会便开始对他产生怀疑，将他逮捕审讯。经过严刑拷打，朱家浩被迫编造了一个惊人的情况：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 AB 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 AB 团的总团长是谢兆之。肃反运动会当即把谢兆之及其“总团”的一切人员全部拿获，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 AB 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赣西南特委根据严刑逼供的结果认定：AB 团已普遍到了江西全省，同时散布到全国范围。它的组织系统十分完整：“全国总团部——各省团部——各地总团部——县团部——区团部——支部——小组”，“在各团部之下设秘书处、军事科（或部）、组织科、宣传科、暗杀科、交通科、审查科、经济科”

对这个关于 AB 团近乎天方夜谭的夸大的报告和赣西南肃出那么多的 AB 团分子，“地主富农”，作为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什么异义。他将这一报告上报中内并附信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员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

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 AB 团，赣西南党班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

根据这个报告，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认为，“在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 AB 团”。于是，肃 AB 团越肃越盛。

1930 年 11 月，在红军中也开始了肃反。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对不打武汉撤退长沙，特别是从吉安撤出甚为不满，红军内部出现了思想混乱，并出现了“羡慕都市生活，积极响应会师武汉”的 AB 团组织。为此，红军各军成立了肃反运动委员会，各师团连排都成立了肃反小组，开始了红军内部的肃反。在短短的几十天当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打了四千多 AB 团。”

肃反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被打成 AB 团分子的越来越多，终于酿成了“富田事变”。

1930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时，偶然在放军司令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负责人便开始怀疑李文林及李的父亲与国民党反动组织 AB 团有联系。10 月中、下旬，总前委在峡江、新余、罗坊召开了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李文林以江西省行委书记的身份出现了这两次会议。会上，李文林等人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表示反对，主张执行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倾指示。会后，总前委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判断：李文林是 AB 团首领。十一月底，总前委决定在江西小行委机关打 AB 团。首先把李文林作为 AB 团重大嫌疑犯扣押起来，又抓了一些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一部分人。总前委根据对被抓人严刑拷打逼出来的口供，相

信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赣西南团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是AB团分子。前委写信给江西省行委，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并派肃反运动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一个连的士兵到江西省苏维埃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进行肃反。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率一连红军到达富田。李韶九一到富田，立即扣押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刘万清（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任心时、马铭等人。在审问时，谢汉昌胡乱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于是李韶九率连一个排的士兵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红二十军军部，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在红二十军中如何“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刘敌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一个营返东固。李韶九同刘敌谈了话。李韶九开口便对刘敌说：“刘敌！你很危险。”刘敌不明究里，问：“我什么危险？”李答：“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刘又问：“供什么？”李说：“AB团”。刘笑着说：“你看我象不象一个AB团？”李说：“我也不太相信，但现在有人供你呀？”刘再问李：“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李反问：“那为什么单供你呢？”刘敌知道李韶九是个素来心术不太正的人，对李说了一番恭维的话，软化了李。加上李韶九和刘敌是同乡，李没有抓刘敌。刘敌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诡计，回去后，刘敌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貽集合部队，对全体战士说：“李韶九这个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随即，带领全营包围军部，捉住军长刘铁超，中内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逃走，军政委曾炳春躲回自己的家乡。当晚，刘敌、谢汉昌率军部直属部队从东固冲到富田，包围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省苏主席曾山、总

前委秘书长古柏逃脱。

富田事变后，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把红二十军拉过赣江，在永新、莲花、安福、汾陵一带活动，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他们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等口号。还伪造毛泽东的笔迹，假造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前委的分裂。伪造信的全文是这样的：“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 CP 与地方 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南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的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毛泽东。”信中滕指滕代远，曾指曾山，陈是陈正人，李指李韶九。

他们还故意派人把此信送交彭德怀同志，被彭当即识破，避免了红军内部大的分裂。

富田事变震惊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前委认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里应外合的公开叛变，“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要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这从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宣言可以看出：“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田分地……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等人的宣言都认定富田事变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活动”。

然而新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对富田事变有不同的看法。中央局刚成立的第二天，即 1931 年 1 月 16 日，发布了《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认为“江西省

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 AB 团要犯”，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决定将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等人开除党籍。决议同时指出，富田事变不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要求赣西南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的互相攻击。决议还强调“纠正过去反取消派 AB 团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些错误是：“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群众站在一边没有参加……于是使一般不明的党员以及群众认为是一种派别的斗争。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唆便打，没有分清 AB 团的成份，没有从各方面考察，只有人打的办法。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专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决议指出，对于那些“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人），就是有人咬他，也不能随便打，如果真有嫌疑，可另调工作来考察他”，“党内负重要责任的同志，须很谨慎的处理”。

2 月 19 日，中央局又发出《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的第 11 号《通告》。通告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实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对于参加富田事变的其余的人，只要“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主张以党内会议的方法解决矛盾。项英还责成红二十政委曾炳春到河西苏区去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同时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

由于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正确处理，“各级党部接到这些

决改和通知后，反 AB 团的斗争就放松了”。平静是暂时的，随着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的到来，反 AB 团的斗争更加愈演愈烈。

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处理有着原则分歧，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组织的认识更不一致，这影响到党的团结和红军的战斗力。为解决分歧，统一认识，中央政治局于 2 月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于 4 月中旬到达江西苏区。在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就明确地说：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决议批评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正确处理是“完全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完全是错误的”。

根据这个决议，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对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领导人重新审讯。于是打 AB 团的错案进一步蔓延和升级。到 7 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奉命回到河东的于都县坪头寨时，从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到副排长以上干部，统统被扣押，其中大部分先后被处决。奉命过河西劝说红二十军过江来的曾炳春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被解散，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

原江西省行委书记、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李文林自然也难逃厄运。1931 年 7 月被以混入肃反机关，陷害共产党员的罪名再次拘捕。次年 5 月被枪杀。

2. 闽西肃反起源于一句错误的口号，而赣西南的肃反则完全是个别人的主观臆断。肃反者自己被肃，根据地的创建者大都被整肃。

赣西南的大肃 AB 团运动必然要影响相邻的闽西苏区。在赣

西南根据地打 AB 团的同时，闽西也开展声势浩大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

1930 年 12 月，闽西成立肃反委员会，开展内部肃反。由于此时正遇国民党军阀张贞部对闽西根据地进行围剿，根据地处于十分紧张状态和傅柏翠事件的出现，闽粤赣边特委和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凭着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报告，主观武断地认为：“在国民党、团匪加紧进攻中，闽西的改造派、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动派也同样的活动”，“第三党以上杭、永定为多，甚至团书记都是第三党分子”。

1931 年 1 月，红十二军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出现的问题，恰好为特委负责人的武断认识作了“事实的”脚注。

这年初，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地方和军队开展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三位革命领袖的活动。在红二十军纪念大会上，吴拙哉等十几名战士因不懂“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激动地喊出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错误口号。有人听到这个口号后，立即报告了一〇〇一 团政委林梅汀，但林没有理睬，于是又报告到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由此认定这是反革命分子呼喊反革命口号，当即把喊口号的战士和林梅汀等十多人全部逮捕。这就是闽西苏区抓获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分子，从此开始了逐步升级的肃“社民党”运动。

1931 年 2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裁判部接连发出了第 19 号，20 号两个《通告》，指出：“各级裁肃委员会，立即召集各区乡裁肃委员联席会，检查过去的工作，加紧健全肃反的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通告强调说：“最近本政府和各地捕获大批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2 月 27 日，《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

扩大会议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反对反动政治派别（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国际社会党、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主要的是要提出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揭露他们一切改良欺骗，暴露他们一切反革命的罪恶……运用群众的力量，消灭反动政治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广泛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肃社会民主党已成为闽西苏区的中心工作。

林梅汀等十几名误喊口号的战士被逮捕后，肃反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审讯。因林梅汀与傅柏翠有较多的工作联系，便被认定为社会民主党，并因此推断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闽西首领。在肃反委员会的严刑拷打下，被捕者只好承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林梅汀为特委宣传部长，黄洪是组织部长，江桂华、张德宗是特委委员。肃反委员会根据这些口供捕人。

3月1至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审判了以林梅汀为首的34名“社会民主党党魁党员”。2日下午，林梅汀等17名被认定为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分子高呼着“打倒社会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倒在刑场上。

在这次大会上，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主审林一株宣布，从军队到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大部分给破获了。号召各地代表回去后“要继续努力去破获未被发觉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机关”。同时，他还宣布了对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三条惩办原则：凡出身不好者，处以死刑；在社民党内负有重大责任者，处以死刑；潜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处以死刑。

3月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22号通告，指出，闽西社会民主党问题“与赣西南AB团同样严重”，“但各级政府对于这一工作还有取怀疑姑息态度，而不能坚决积极的执行领导群众一致动员肃反。这是非常错误的危险倾向。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不要留情感的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严密查缉一切反动分子”。

肃社民党运动进入日趋严重的状态。

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在他的指导下，闽西肃反进入了高潮。

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后，召开了永定虎岗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纲领。

4月4日，党中央写信给闽粤赣特委，指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联系，必须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来信还指出：“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观念，要给予无情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抗令主义，要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来。”

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闽西的肃反更是走入极端。肃反不分敌我矛盾，只要是工作消极的，保守的都作为社会民主党分子抓起来。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借机整人，乱供乱咬。

为了从快打击“社会民主党”，闽西苏维埃政府下放肃反初期自己控制的杀人权，允许各级政府“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本政府追认”。于是各地仅凭逼供材料，乱抓乱杀。许多无辜者命丧黄泉。

在乱打乱杀的形势下，一些共产党员不愿枉死，认为“与其坐而待毙，不如临死一拼”，因而出现了著名的“坑口暴动”。

5月27日晚，驻杭武县三区坑口的第三大队在党代表何登南、大队长李真率领下包围区苏共党区委及当地乡苏，扣留闽西政府巡视员罗寿春及闽西医院负责人。

坑口暴动是闽西肃反为乱抓乱杀给逼出来的，“被捕走的负责人毫无损害”这点可作证明。但闽西苏维埃政府却认为坑口暴动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强调“肃反要迅速坚决，要捉的快捉，